



## 古刹迎来上海600名灾童

1938年9月11日上午，“谋福轮”（新宁绍轮改名）从上海载了600名灾童进了甬江，在宁波外滩码头靠泊。

现年90岁的戴天明回忆说：“八·一三，日寇打上海，炮火连天，不少人家家毁人亡，一些孩子流落街头。上海的大老板、大慈善家竺梅先创办了国际灾童教养院，但此时上海已容不下这样大的一个教养院，于是，他把教养院办在了他的故乡奉化深山千年古刹泰清寺内。当时，我们兄妹四人最大的也不过是十二三岁，听到有书读，有饭吃，心想怎么有这么好的事……先到上海宁波同乡会报到，换上工装裤，白衬衫。竺院长勉励我们：‘要好好读书，学会本事，为国家出力。’”

宁波当时还未沦陷，码头上来了各界代表。”戴天明说：“中学生唱着歌，欢迎上海来的灾童，还有点心慰劳，我们仿佛回到了自己家里。”

现年91岁的丁复俊记得：“我们排着队穿过灵桥，坐上了航船，到了横溪，登岸就向泰清寺步

行。”池桂根则回忆说：“一路上青山绿水，过了楼隘，再过岙口，看到一座高大的寺院，听到钟声当当。”韩邦桢说：“这钟声洪亮、悠远，仿佛在欢迎我们。”

那一天，让灾童印象最深的是几百人的队伍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忙着前后照顾，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副院长徐锦华。她走前走后，时常停下来抚摸孩子的头：“乖囡，你吃得消吗？前面就快到了。”有一顶元宝筐里躺着一个孩子，她吩咐轿夫：“到了泰清寺，你们直接抬到我的寝室来。”原来这个孩子得了肺痨，面孔苍白。徐院长像妈妈一样，把病孩和其他孩子隔离开来，她亲自照顾，为其增加营养，还叫孩子反穿衣裳晒太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孩子居然生龙活虎起来。

被记忆牵动的这些老人，当年不过10岁上下，到2013年参与录音录像时，除了88岁的苏锦炎，大多已年过九旬。

## 一所正规且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学校

国际灾童教养院不仅是养，而且还要教，要培养孩子成才。从教养院出来的灾童，后来有当工程师的，有当教师的，有当护士长的，有当会计师的，也有参加陆军军官学校的，有参加三五支队（浙东新四军）的，有的还做到了师团级干部。

现年94岁的王家淑说：“我就是在泰清寺接受了教育，为后来打下了基础。”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回忆：“一年分三个学年，每一学年四个月，没有寒暑假，有小学部、初中部。师资水平很高，老师中有留学生、大学生、工程师。这是一所正规的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，我后来在部队当文化教员，全靠教养院打下的文化底子。”苏锦炎说：“有许多教师本来是民丰、华丰造纸厂的工程师、专家，他们不愿留在沦陷区，跟着竺院长来到深山给孩子们上课。国文课的课文是徐院长亲自选编的，有岳飞的《满江红》词，文天祥的《过零丁洋》诗，也有选自《古文观止》的经典文章等，代数、几何读的是英文原版，有时也读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等原版文学作品。”

那时，每晚熄灯钟声敲过后，徐锦华就会巡视男女院童寝室。有的孩子把被子踢开了，她就把被子盖好。有一次巡视到女寝室，一个叫蒋桂珍的孩子枕头边露出一封信，她展开一看，原来是蒋桂珍写给邻居叔叔的，称自己来到了教养院，有饭吃，有书读，很想念他们。就是觉得此生命苦，年纪大起来，无处安身，还是找一个庵堂寺院出家算了。这时候，徐锦华听到蒋桂珍的啜泣声，便问她：

“小囡，你哭了？你还没熟睡？”蒋桂珍叫了一声：“妈妈，我梦中见到了妈妈了！”徐锦华抚摸着蒋桂珍，说：“囡啊！我就是你妈妈。院里的同学就是你兄弟姐妹，你安心睡吧。”第二天，徐锦华就在教师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：“这些孤儿大多有丧家丧母之痛，他们的心灵创伤很深，我们的教育重心要让孩子感到有爱，感到温暖，也要叫孩子爱人。”

除了功课外，徐锦华还特别布置：“要教唱抗日歌曲，要搞文娱活动，以调剂孩子的生活，让孩子们开开心心又从中得到爱国主义的陶冶。”从1938年秋开学到1941年4月宁波沦陷的三年中，孩子们学会了所有当时全国流行的抗日歌曲，如《大刀进行曲》《流亡三部曲》《救亡军歌》《太行山上》《长城谣》等，而且排演后到奉化城去演出。

1941年4月19日，日军登陆镇海口，20日宁波沦陷，22日奉化沦陷，徐锦华和竺梅先知道日军来了，提早做了应变布置。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这种歌不能唱了，于是改唱李叔同填词的“长城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唱贺绿汀谱曲的《秋水伊人》，这里的“伊人”，暗指爱国者，于是这首《秋水伊人》又被孩子们反复传唱。焦润坤多年后回忆道：“教养院还有一首院歌，孩子们天天唱：‘吾生有幸/值风潮鼓荡/卷入洪炉，百炼千锤成铁汉/天降大任/必苦其心志/劳其筋骨/饿其体肤/富贵不淫/贫贱不移/威武不屈/中兴责在吾曹……’”

## “要保证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”

泰清钟声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孩子们经历了三个春秋，个个健康活泼。但是1940年、1941年宁波、奉化沦陷前后，不少院童突然感染了两种疫病，一种是外科病，疥疮，另一种是疟疾。

焦润坤回忆说：“生了黄脓疥疮，又是脓又是血，有时皮肤和衣服粘在一起。徐院长看了心疼，她叫院医去买了硫黄药膏，叫孩子们把衣服脱下来，涂上药膏，衣服全叫护理组洗净消毒。”“我也得了一种恶性疟疾，俗称卖柴病，冷起来冷得要

命，盖两床被子也没有用，发热时又说胡话，只想跳到溪坑里去浸。”

疟疾对小孩的身体损害很大，徐院长亲自到宁波城里购一种金鸡纳霜丸，宁波没有这种药丸，只有粉，她就把金鸡纳霜粉买来。怕孩子们嫌苦，用嫩菜叶一包一包地包好，叫老师劝告着让孩子吞下。600名孤儿的健康，她作为一个母亲，切切在心，她常说：“这批孩子，大部分没有爹娘了，我就是他们的爹娘，我要让他们死去的爹娘，在地下能安心。”

## 拒任伪职，大义对日酋

1941年4月下旬，宁波、奉化沦陷，竺梅先、徐锦华与教师们商量，要做好应变准备。寺外大门、墙上的“驱逐日寇”等抗日标语，改成了“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”等；抗日歌曲不能公开唱了，把有关抗日宣传的资料悄悄收藏起来。

最先来到泰清寺的是汪伪第十师师长谢文达。谢文达这个人在辛亥革命、北伐时期与竺梅先是一起的，与徐锦华也熟。说话间，泰清寺钟声响起，院童该上课了。

谢文达：“佑庭老弟啊！我这次来，非为别的，只是想请老弟出山，在宁波主政……”

竺梅先：“文达兄要失望了。北伐以后，兄弟一直致力于实业救国，最近办了一个国际灾童教养院，幸得国际友人和诸位大亨支持，我只想把这批失去亲人的孩子教养成人。宁波除了日军，老兄好像

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担起中国抗战重任的不仅仅有我们前方的战士，还有那些在后方为中华民族默默无私奉献的人。竺梅先便是其中之一，身为奉化人的他，和妻子徐锦华一起，在家乡办起了一个“国际灾童教养院”，先后帮助了600多个在战争中失去家庭的孤儿。为了重现竺梅先、徐锦华夫妇在奉化深山泰清寺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的故事，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从2013年1月至2015年10月，四上北京、二去上海、三往杭州、一下香港，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采访了数位当年的院童，这些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声泪俱下，万分激动地回忆起往事。

随着追踪的深入，历史被一点点还原，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凝结为电视专题片《泰清钟声》以及《梅华魂》《梅华之歌》两书。本月中旬，这些作品将举行首发式。

# 院中慈严今何在 竺梅先、徐锦华夫妇和「国际灾童教养院」的故事

大 地 文



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

学学习机械，回国后在杭州造纸厂做技师，现在在教养院教书。”

徐锦华接上说：“此处系国际灾童教养院，全院除了几百个战争孤儿外，还有几十位负责教养的教职员。我作为副院长，全院孤儿的母亲，对孤儿负责。”

前蔚寿山在这位中国妇人面前不敢造次，只问：“如果我在中国阵亡了，我在日本的子女也成了孤儿，不知院会收留吗？”

徐锦华答：“我首先不希望阁下的子女成为战争孤儿，万一发生这种不幸，我们国际灾童教养院对战争孤儿一视同仁。”

## 竺梅先魂归故园

竺梅先去永康方岩是带病出发的，时逢日军发动浙赣战役，沿路全是逃难的人群，日机不断轰炸。竺梅先很担心一批运往江西、湖南的货物，说：“教养院等着这批货物的收益呢，要买粮食，孩子们要吃饭呐。”晚上住方岩旅馆后，竺梅先不断咳嗽，还吐了两口血。陪同的许兴馥着急了，要送他去医院。竺梅先摆摆手说：“老毛病了，不碍事，你去药房，买点止咳药水来。”第二天一早，他穿戴整齐，按计划去见省主席黄绍竑。黄大笔一挥，批下几百担粮食。回到住处，许兴馥要护送他回泰清寺，可是竺梅先说：“叫兰卿（女儿）陪我回去，你去追赶那两车货物。”

竺梅先回到象山，一病不起。临终遗言叫徐锦华一定要把孩子教养成人，并且以陆游《示儿》诗作为遗愿：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。这是1942年5月底，竺梅先终年54岁。不久灵柩被运回泰清寺。苏锦炎含泪回忆道：“院长死时还很年轻，一个大老板，他本来可以在家享福，或者到香港去做寓公，可是为了我们600孤儿，他毁家纾难，把命都搭上了，我们院童跪在地迎他的灵柩归来，痛哭流涕，院长就是我们的父亲啊！比父亲还亲啊！”

6月5日，公祭院长，秘书徐无生写了一篇祭文，当念到：“……孤儿幼女，流离道旁，失养失散，必致夭丧，见死不救，岂有肝肠……公为慈父，助以孟光……冒暑奔走，实为筹粮，积劳致疾，呕血如浆……”全体院童号啕大哭。徐锦华劝解他们：“孩子们，竺院长走了，我们要听他的话，好好学习，王师北定中原日，不要忘记告诉他。”

教养院的老师，依据贺绿汀谱曲的《秋水伊人》，写了一首悼念院长的歌：

望断丹山（指象山），不见院长的慈颜，精尽力残，魂归泰清山，……

几时归来啊！院长哟，几时你才会回到泰清的故园！

## 36个院童报名参加新四军

竺梅先去世后，灵柩暂厝泰清寺后大殿。这时谢文达又来了，还带来了他属下一个团长张侠魂，假惺惺地说不知道佑庭老弟仙逝，这次来是为了扩军，张侠魂团长驻奉化、鄞江一带，正需要一批有文化的青年。

这一要求当即遭到徐锦华的拒绝，“我们这批孩子年龄还小，决不当和平军。”待谢文达灰溜溜走了之后，焦润坤、戴天民等36个院童给徐锦华呈上了一封决心书，徐锦华接过一看：“徐院长钧鉴：启禀者，我等36名男女院童，承蒙先院长救我等于水火之中，再生之恩，天高地厚，报恩之心，始终未泯。今先院长积劳成疾，饮恨而逝。我等谨遵先院长遗训，惟盼早日奔赴抗日战场，光复中华，以慰先院长之天之灵。”

下面是戴天民、戴仁侠、娄金祖、焦润坤、周庭芳等36个院童的签名。

徐锦华一边看信，一边喃喃自语：好孩子，你们的心思我明白了。只等沙主任去三北联系回来。

沙主任就是沙玉振，1937年冬，他曾参加过竺杨老前辈在洞桥天王寺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，又称“飞鹰团”。他去三北联系上了三五支队，支队派了张队长前来接应。

那一天正好是蒋桂珍出嫁的好日子，徐锦华亲自送蒋桂珍上轿。徐锦华曾立下规矩，小囡出嫁，必陪嫁棉被一条、箱子一

只。徐锦华还特地把自己八成新的一件大衣送给蒋桂珍。蒋桂珍跪在地上，眼泪掉了下来，说：“姆妈，我以后还会来看你的。”

沙玉振陪着张队长来到泰清寺，徐锦华有点舍不得：“张队长，天下雨了，我这36个孩子，是否可以过一天再上路。”

张队长：“院长，从泰清寺去三北，要穿过奉公路，有日伪军岗哨，夜里下雨行军最妥当。不能耽搁久了，得尽快越过封锁线。”

“这批孩子身子骨还嫩，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。”

“院长请放心，他们会锻炼出来的。”这时雨越下越大，天也渐渐暗了下来，深山里夜晚来得特别早。徐锦华又要求：“夜里我要亲自送我的孩子们上路。”

戴天民、焦润坤等36人，正好是十七八岁的年龄，临行前他们要在竺梅先灵柩前跪别。徐锦华说：“你们现在当军人了，军人不能下跪，行个礼就可以了。”天完全暗下来了，深山古寺一片寂静，36个青年站好队，向徐锦华告别。徐锦华叮嘱说：“可惜要淋雨了，夜行要小心。”

张队长说：“徐院长，你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他们的。院长，你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！”

70多年后，年过九旬的焦润坤说：“我们教养院出去的院童，没有一个当汉奸和平军的。”



1990年9月6日“梅华亭”落成仪式上，当年部分院童合影

## 魂梦频频绕泰清

泰清钟声又响了起来，谢文达又来了。他假意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嫂夫人，我前些日子去了一趟南京，汪夫人也问起教养院的事，汪夫人很乐意提供帮助，没有什么条件，只要让她挂一个教养院董事长的名字。”

“这不就是陈璧君的条件吗？……什么陈璧君，什么董事长，我宁愿把教养院解散，也决不让我孩子当她的贴金工具。”

徐锦华，这位600名孤儿的母亲在教养院解散后，到民丰造纸厂子弟学校执教，继续从事她热爱的教育事业。1947年病故，终年55岁，解放后与竺梅先合葬于鄞县宝幢公墓。

沧海桑田，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当年的院童苏锦炎从杭州友谊商店退休后，应邀到浙江省工商联帮忙，管历史资料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看到介绍竺梅先的资料里讲到国际灾童教养院的事，她跟工商联的处长李希说：“我就在泰清寺教养院待过。”李希就叫她把“情系泰清寺”的事迹写出来，刊登在《浙江工商》刊物上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引来了许多昔日院童的关注。

彭长根等10多个院童，后来到了台湾，彭长根成为一名作家，在台北的《宁波同乡

会》刊物上写了很多怀念竺梅先、徐锦华的文章，并且出了书。

后来，两岸同学决定在泰清寺旧址（1951年辟为水库）建造一座全石质亭子，取竺梅先、徐锦华两位院长的名字命名为“梅华亭”。1990年8月，梅华亭落成，9月6日举行揭幕仪式，当年的院童到了不少，当时都已年逾七旬。

那一次，焦润坤首次出现，大家很吃惊，因为之前建院50周年出纪念刊物时还未找到他，以为他南征北战已经牺牲了。作为一名新四军老战士，2014年7月7日，他曾与习近平总书记一起在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为“独立自由勋章”揭幕；那一次，彭长根还走得动，也特地赶到梅华亭，说：“如今我有什么成就，当归功于泰清寺，归功于我的慈母。”彭长根的一首诗，道出了所有院童的感恩心情：

可叹天涯游子心，魂梦频频绕泰清。

醒时泪眼对孤月，耳边犹闻唤囁声。

寒山应识苍颜容，幽泉淙淙诉旧情。

院中慈严今何在，音容常驻梅华亭。

（照片由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）